

從 SARS 到新冠肺炎

——我的抗疫心路與慈濟因緣(上)

口述／羅慶徽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從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臺北大都會區，辭了工作，翻山越嶺轉到人口稀少的東部花蓮上班，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人生一大轉折，但若追本溯源，其實這個大轉彎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種子，只是這顆種子發芽後，花了十多年才開始生根茁壯。

來花蓮慈濟醫院服務之前，我在輔導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就醫保健處擔任處長，負責管理北、中、南三家榮民總醫院、十二家榮總分院、十六所設在榮民之家內部的保健診所，以及照顧榮民的醫療政策。

二〇一八年時，受邀到慈濟演講，談高齡醫學與照顧整合，林欣榮院長是我國防醫學院的學長，要帶我會見證嚴法師，本想是不是該事先約一下時間才好，他說不等了「直接出發」。還記得是農曆春節前後，滿屋子的客人。

妙不可言的源與緣

那時候仕途得意，大家都覺得我厲害，在長官、立委、部屬之間都深獲疼愛。但心裡面知道我累了，心裡總覺得缺乏什麼？卻從未跟任何人講。林院長介紹我後，上人問我的第一句話說：「你會不會累？」我差點哭出來——當然忍住了，哪有第一眼看到人就掉眼淚的！後來又交談了幾分鐘。上人接著又說，「我跟你因緣這麼深，你為什麼現在才回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人。我還是忍住，沒有哭。一個不認識的人跟我講這些話，我很震驚，但竟不覺得意外！

眼前的比丘尼那麼瘦、講話聲音小到幾乎聽不到，卻要跟這麼多的人講話，直覺得好可憐，但這人究竟有何能耐，兩句話就讓人幾乎招架不住？心想「如果有機會的話，真想幫您分擔一些責任！」但隨即轉念作罷，因為不知道發願要付出什麼代價，而我不可能來慈濟。

當時長官對我已有安排，我自己也有規畫，而且太太也不喜歡「太鄉下」的東部，可想而知上頭這「兩個老闆」都不會答應。天知道一回去，農曆年後開工，直屬長官被調職了！林院長聞訊大喜，直呼「你來啊！你來啊！」我據實以告工作上的老闆換人沒有用，還有太座大人那關。畢竟，太太也不能換，也捨不得換。林院長要我帶內人來見上人。

「那什麼時候？」我話雖這麼問，其實是想 hold 住。

「初一十五啊！」林院長始終積極跟進。

本以為就此打住，但老天爺自有安排。

「是哪天要來？你怎麼都不回我話？」一心想著他可能是初一或初二在，大概過三天我都沒有回他話，林院長就打電話來問。

「你哪天在，我又不知道，怎麼去？」

「我是初一到十五啦！」林院長的意思是初一到十五都在精舍，「不是初一跟十五兩天！」隨時可以來。

「什麼時候？」他要我說個時間，我又放了兩三天。他又再來追問。

「我還沒買票。票不是很難買嗎？」

隔不久，「欸，去拿啊！」林院長幫我買了票。

「在哪裡？」我是真不知道，以前都是參謀跟助理搞定的。

「去便利商店。」

我心想，呃，我不會拿票耶。是說，哪個將軍會自己拿車票的？部屬自會把事情處理妥當，不是我要大牌。最後……是許文林副院長幫忙取票，然後送到我住家附近的捷運站見面。只能說，感恩他們用行動一步步瓦解了我的「Hold 住策略」。

我們夫妻依約前往花蓮拜會上人。那天沒別人，一、兩個鐘頭裡，上人跟我太太聊什麼？聊那平凡得不得了的環保，PP、PE（塑膠材質簡稱）什麼的，也不太跟我講話，他很清楚重點在哪裡。講著講著，老人家突然間講了一句話：「會當來某？（可以來嗎？）毋湯厚（不要讓）師父空歡喜唷！」看到老婆點頭、好像要掉眼淚了，趕緊阻止她：「妳不要亂答應，回去想清楚唷！」哈！換我緊張了。這很重要耶！答應了就要做到。我這人膽小，不敢食言，更何況對方是高僧。雖然當場沒有說好，但我倆都有個底，大概決定要來了。只是那時輔導會一直不放心，後來也在不可思議的因緣下化解了。

這場東進花蓮的舉家大遷移，讓我們夫妻多所商量，包含工作內容、生活習慣、對慈濟文化是否能適應等等全面性的考量。我在海外讀書的時候，學費不夠就去當一家臺灣醫院和一家美國醫院的醫療顧問，大小場面見過，所以位置大小不成問題。我本來的辦公室空間之大，裡面還設有會客廳、個人休憩室及衛浴設備。因為我清晨四點半起床，所以中午一定要二、三十分鐘完全休息，下午才有辦法工作。可是看到林欣榮院長的辦公室好小唷，我一直在找他的廁所在哪裡？沒找到！哈！那據此類推，副院長的也一定沒有嘛！

再者，我又聽說慈濟非常的……像我太太的想法是說，「做了一輩子軍公教人員了，聽說那裡比軍公教還軍公教吶！」顧慮真的是有。例如其他人說飛機很吵之類的，身為空軍少將，聽到飛機引擎隆隆作響我很開心，因為知道空軍兄弟在上面飛得很安全，不會睡不著。飲食上雖餓不得，但只要是乾淨的食物、不要讓我等，吃素不是問題。至於要不要跟師父頂禮？要再次感謝林欣榮和許文林兩位前輩。他們特別跟我講、強調兩三次：「你不要頂禮。我們是弟子，我們頂禮，你不是，請合十即可。」林院長更直白：「上人要的是真心，不是表面！」直到四、五個月後，有一回親自體會到上人的悲智雙運，我才心甘情願自主頂禮。沒有被強迫，這一點對我也很重要，很感謝有這一段歷程。



二〇〇三年五月抗熬期間，香積志工將做好的便當打包裝箱，送往松山醫院。攝影／林炎煌

回顧 SARS 百感交集

跟上人，與慈濟的淵源，要從二〇〇三年的 SARS 風暴說起。

當時在府院的決策下，指定國軍松山總醫院成為收治 SARS 病患的專責醫院，整家醫院急診、門診全數暫停服務，專門治療從各醫學中心確診而轉送來的 SARS 患者。有人形容這比封院還可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意謂著醫療團隊不用再花時間篩檢、處理「不是」SARS 的病人，雖然這個做法很優，還是希望臺灣永遠不會需要再用到。

路過幫忙 從翻譯變執行長

回想起來，我的抗煞任務是「路過」撿來的。早先我從國軍松山總醫院調任到三軍總醫院當主任的時候，為了兩個孩子的就學需求，仍借住在松山的宿舍。國軍松山總醫院（松醫）的前身就是空軍總醫院，也是我出國讀書之前服務的地方，所以很熟悉。那天是星期六，我經過院區外，一看覺得很奇怪，怎麼人來人往亂成那樣？後來又碰巧遇到衛生署約了美國疾病管制署的人來臺協助防疫，我就順道陪同進去醫院做一下翻譯，協助聯絡和討論事務，兩個鐘頭後我想幫忙應該幫得差不多也該告辭了，他們



二〇〇三年，駐守松山醫院，收到防護衣的羅慶徽醫師向慈濟志工合掌行禮。攝影／王輝華

卻開口問我可不可以繼續幫忙？時逢週末，我便答應下來，於是週末連續兩天都到院幫忙。

到了星期天下午四、五點，李建賢醫師（松醫抗SARS專責醫院總指揮）跟我說：「羅醫師你一定要留下來幫忙。」我直言假日幫忙沒問題，但明天要上班欸，「我是軍人，不能聽你們的。」陪同外賓的黃芳彥醫師就此展開電話連繫，先打給國防部長取得同意，聽聞我只聽直屬長官的，又再打電話給軍醫局張聖原局長（今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策略長），接著又致電給三總的陳宏一院長，要他跟我講：「好啊，你留下來幫他們一個禮拜。」既然陳院長指示，那我就聽命行事。黃醫師繼續與陳院長通電話，因為「羅醫師說要公文……。」最後雖然他們兩人商量好不要公文了，我還是堅持要聽到院長親口告訴我才相信。「好啦，賣擱悶啊（不要再問了），你先幫一個禮拜啦！」院長在電話中當場指示，沒想到，原本的路過，演變成「國軍松山總醫院抗SARS專責醫院執行長」的特別任務，而說好的支援一週，終究變成四十幾天無法回家。

從物資補給到病床 一手張羅

當時政府的做法，等同於將松醫給徵收了，由臺北榮總、三總、馬偕、國泰、新光及長庚醫院等六家醫學中心各派一位醫師及六名護理人員，大家來輪班對SARS病人的照護工作。我身兼執行長，被外人戲稱是「配掛六國相印」，實則成員都來自不同的醫療體系，又對松醫的行政運作並不熟悉，於是對內的協調溝通，全部落在我肩上。在那段非常時期，不管收到什麼需求都必須要快快快，盡快解決，因此在管理調度和資源統整上可說是遇到很大的困難。我每天忙得團團轉，在緊繃的時間壓力下，又得要花很大的氣力去聯繫、處理發生在不同對象身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各種可預期和料想不到的問題接踵而至。

有些事情當時只是頭痛，現在回想起來反倒變成一個笑點。有位女性病人來告訴我：「我月經來了。」「咦？妳跟我講幹嘛？」我的反應也很直接。「執行長，我出不了院區啊！」這時我才會過意來，因為從來沒想到會有一個女孩來跟我要衛生棉啊！我連忙道歉，「好好好，我幫妳想辦法。」趕快找到志工幫忙代買回來應急。以前沒做過的事，那陣子都要做。還有人跟我說他的狗狗在家裡，但他現在被隔離了，沒人給狗狗食物與水……總之什麼光怪陸離的需求都有，而我就是要當那個聯絡所有事情的那個人。

如果今天有確診病人要轉進來，我要去評估樓上的床位夠不夠？我有點像是醫院的總管，什麼事情都得張羅。團隊裡的人都很有能力、也很有心，但是對松醫體系本身的運作了解有限，該怎麼合作？該怎麼指揮？這種事怎麼會被我碰上？我根本不知道。要是一開始我晚個五分鐘路過不就沒事了？但因緣就是這麼奇妙。況且以我這種性格，看到醫院前有幾個人在那邊比手畫腳，溝通不良，剛巧英語我又聽得懂一點點，



二〇〇三年五月「同心共濟
弭災疫」慈濟人送愛防疫行
動，贈送 CD 音響、慈濟歌
曲、祈福卡安定松山醫院醫
護及病人的心。左為羅慶徽
醫師。攝影／王輝華

當然無法不出手幫忙。那時候還不知道松醫已經被決定要做抗煞專門醫院，我也已經不在那裡服務了，但就這麼走了進去，走進一個意想不到的發展。

安定人心安撫入眠的聲音

在抗煞任務期間，慈濟志工團隊都來醫院送素食便當，也送很多物資，有趣的是，我收到什麼都發下去分享給其他夥伴，唯獨偷偷留了一臺大大的可以播放錄音帶的手提音響。晚上吃了精神科醫師開的安眠藥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就放錄音帶聽法師講法。絕大部分的內容是似懂非懂的，不是我閩南語不好，也許是因為心裡有太多事要處理，躺下之後還是無法放空，反正那時腦袋就是轉不過來，可是那聲音卻能讓我放下掛慮，進而入睡。大概過了半個月還一個月，我又開口跟慈濟要了第二臺手提音響，「聽壞掉了，請再給我一臺。」SARS 任務持續了多久，我就聽了多久的上人的開示入眠，那一個多月期間我哭得可多了，全靠那臺機器擺脫失眠。那時上人與我並沒有見過面，現在想想，後來上人講的也沒錯，他等我很久了。或許我之所以覺得人生缺乏什麼？是師門在呼喚，而我在想家，心靈的家！

當時我聽不懂上人講什麼，可是我的心卻被觸動，還能平靜入睡，這是很奇妙的感覺，但對我來說卻是安定的依託。後來聽有些慈濟人分享他們第一次與上人的接觸時也有過類似的感應，就是聽不太懂他所說的，卻莫名的一直掉眼淚，像是某種深層的連結給接通了。這種因緣是什麼？像我這種講求邏輯論證的人，到現在還想不通。其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高雄慈濟人合力趕製隔離衣，分送全臺醫療院所，園區如一間小型成衣工廠。攝影／張兆和

實我一直不太願意分享這一段，是因為我不知道原由為何。這一點很難講清楚，卻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經歷。

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近慈濟。那種情況，那種處境，志工團體來來去去，奇妙的是，慈濟人還留著，或者該說是「慈濟人一直都在」。一直以來，我因為太忙了，也覺得自己能力不夠，不太敢接受外面的訪談或演講，但去年二〇一九年一收到高雄慈濟人的邀約，我「欸」的一聲就答應去分享，我跟志工們說我是來「報恩」的。其實在松山醫院剛承擔起治療 SARS 專責醫院時，醫療團隊是沒有隔離衣這項防疫裝備的，因為臺灣從來沒有這樣嚴重的疫情發生，感恩在高雄靜思堂那邊的工廠（應該是高雄慈濟靜思堂的「巧藝坊」），許多慈濟志工日夜趕製防護衣，再專程送來松山醫院，讓醫療團隊全部都穿上了防護衣，這項提供防疫物資之恩，多年來我始終銘記於心，當高雄慈濟人線上讀書會邀約演講，我當然非去不可，「有恩報恩」！

救人的窘迫 醫者的煎熬

在松山醫院初期，所有的裝備和補給都是陸續到位，對病毒的認識與防護都是摸索而來，甚至一開始連口罩要戴幾層都不知道。感染科專家王立信醫師（今花蓮慈濟醫院院長室顧問）和一些學者專家討論很久，到底要戴一層？兩層？還是三層口罩？

每個人都是專家但卻各有堅持，著急決策的過程中不乏激烈對話，因為沒有標準啊！對我這軍人出身的來說，就覺得反正也沒人知道誰對誰錯，就先討論出一個方法做做看，不對再改嘛！有時候私下忍不住抱怨：「再這麼吵下去、停擺下去，乾脆全部槍斃掉算了！」還好沒人把我的氣話當真！懺悔懺悔！

不過來自各院的醫療夥伴，他們真的很接納我、很喜歡我、包容我。缺乏食物，找羅慶徽；缺乏裝備，找羅慶徽，需要什麼都找羅慶徽，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那個羅慶徽脾氣不好，可是大家遇到問題，還是通通找我！我自嘲這也是一種好人緣啊！不開心就想：「我是股東嗎？什麼都要找我……」然後又繼續幫大家張羅。

意見不合之處還不只這些，事關重大的治療方式，更是五花八門，要統合非常棘手。確診患者分別從臺大、和平、北榮等各家醫院轉來，每家醫院原本都有一套各自的做法，雖然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治療，集中到松醫究竟該採用哪一套方法，各院也沒有共識。眼看搶命時間緊迫，我拍桌下令：「我告訴你們，就這樣——原來用什麼方法，就把那個療程做完。不要囉嗦！」感恩這群前輩、老師們，對我還真是包容，「好啦好啦，那……那就這樣。」有些人喊我羅胖，但都沒有惡意，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想辦法窮盡一切救人便是，哪怕沒有人知道哪一種方法比較有用。往事不堪回首，太多糾結，萬不得已我真不喜歡回憶這些！

負荷臨界點 抗煞壓力鍋

那一個多月裡壓力有多大？大到我一個月就少了八公斤。物資逐步到位後，每餐想要吃什麼，絕對有人幫忙準備好，可是我的體重卻直直落。這輩子減肥就只有那次成功。

想來想去，唯一的減重妙藥就是壓力。每天在面前輪轉的、包圍我的，都是人間最殘忍的生死拔河。早上看了一位病人的肺部X光片，下午再照一次竟然全白了！天哪，這位病人可能不行了嗎？隔天早上就聽說他逝世了。死亡就是這麼讓人措手不及。但是身為第一線醫療人員，我們必須振作，因為還有不知道多少病人需要援救，我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黯然神傷兀自淚流。

另外，由於病床數有限，為了管制入院人數，我們請其他醫院先傳真病歷摘要過來，我們先進行判讀，再決定是否收治入院。每天都有幾十份傳真病歷躺在那裡等著我們判讀，可是眼前醫院沒幾張空床啊！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二日，當時的花蓮慈院王立信副院長北上支援松山醫院 SARS 防疫工作，教志工如何分辨口罩種類。攝影／何瑞昭

我們一面擔心病人進不來，又不能讓不是罹患 SARS 的病人進來，當年全臺灣的每位醫師都是第一次和 SARS 交手，在那麼緊促的判別時間裡，有沒有可能誤判？我們雖然忐忑，但也只能互勉盡力，我們不能因為害怕萬一做錯而暫時停下腳步，與 SARS 生死拔河，分分秒秒都不可以耽擱。

一開始我們只能收一百多床，後來慢慢擴充到五百床，不管有沒有收滿，只要病人進來就是壓力。可想而知，前面幾週病床數吃緊，實在很掙扎啊！另一方面，我們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染煞。我家就在松山醫院後方宿舍，但我卻有四十幾天沒有回去，深怕萬一自己染煞又傳染給家人。太太來送東西，只能擺放在至少十公尺遠，我再去拿，遠遠地看著彼此，不能太近、不能擁抱……電影或電視上面演的，是再熟悉不過的親身經歷。

一般是從新聞媒體得知某某醫護人員殉職了，但對我們來講，他可能就是昨天坐我們身邊的同仁。松醫團隊中，仍然有一位照顧 SARS 病人而染煞的護理同仁，我記得有一天中午她就坐在我旁邊吃飯，只有那個時候口罩可以拿下來。其實我們同事之間都應該坐遠一點，真是不懂啊，也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聽說她支援結束回去後就發燒了，天哪！才二十幾歲的年輕生命啊！好在後來她有活下來，但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聽說走路都會喘。你說我怎麼會不難過？對我來講這不是故事裡的人物，他們是在真實的世界上，與我一起執行艱難任務的夥伴啊！

雖然抗煞團隊都有徹底犧牲的心理準備，也有準備好遺書的，但其實有一大部分附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日，志工虔誠為松山醫院隔離人員祈禱，希望大家皆平安出院。攝影／牛成德

近的居民並不歡迎我們，他們害怕醫院萬一爆發院內感染，身為鄰居的他們也會遭殃。有同仁下了班去理髮，理髮師得知眼前這位客人在松山醫院工作，他就不剪了。看到醫院員工頂著剃了一半的頭髮走回來，我實在是無法就這麼算了，打電話給理髮師，跟他說我第二天要「公開感恩他專門替松醫同仁免費理髮」，最後他過來醫院一趟，幫同仁把頭髮理好。可能有吃素食的關係，我沒有與他結樑子，但也沒在客氣！醫療人員在這麼艱困的形勢下盡心盡力守護臺灣已經夠難為了，我可以理解他的害怕，但是無法接受同仁受到這麼過分的對待。

半夜哭泣的醫師

記者施靜茹

「醫院裡面有一位醫師，半夜會起床哭半個鐘頭，宣洩壓力後，才能繼續睡覺。」被派到國軍松山醫院的精神科專科醫師林喬祥，在觀察松醫隔離病房實況後說，SARS的病人或治療病人的醫護人員，現在都非常需要精神醫療團隊關心。

林喬祥是台大醫學院流行病學博士，曾在松醫精神科服務，六月他將赴慈濟醫院任職。四月他本來在歐洲旅遊，在當地媒體看到台灣發生SARS後，取消接下來的紐約之旅，趕回台灣支援。

「病人普遍擔憂的是，還要關多久，自己的命會不會沒了？」林喬祥說，SARS病毒來得如此凶猛突然，病人在很短時間內，面對被突然隔離，行動自由或生計都受影響，許多人都還處於面對衝擊時的否認、孤立和憤怒三個階段，像和平醫院封院時，有一名病患上吊，雖然不能說是封院的後果，但與病人突如其來的孤立感，

脫不了關係。

他表示，病人接下來，會進入接受事實與憂鬱階段，病房內雖然有精神科醫師、社工師、心理師和職能治療師待命，但應該要有更多的精神科團隊投入。

精神科常講求問診時，與病人有眼神接觸。林喬祥說，他在隔離病房裡也很想這樣接觸病人，但擔心防護衣不夠，只能改以電話訪談，即使如此，病人知道有人關心他們都很感激。

醫護人員也存有一種「我要做事，但不要做烈士」的心情。

林喬祥說，就有一位醫師，白天治療病人，獨當一面，但到了半夜，他會嚎啕大哭，林喬祥曾問他需不需要開藥？他雖然婉拒，但可見這些衝上SARS戰事前線的醫護人員難為。

這名醫師每天要面對數十名相關病患，為他們的生死操心，他又求好心切，因此帶給自己甚大的壓力，每回在半夜痛哭後，壓力獲得紓解，隔天

仍正常工作。也有些醫師是以信仰或自我打氣，來度過這個生命關卡。

林喬祥寫了一篇文章：「不要讓前面這些人的犧牲白費了」，以電子郵件寄給他醫界的朋友，他引用高雄榮總急診部主任顏慕庸寫的一首英文詩：「當這一切過去，我們都會健在；我們可拿下面具（口罩），彼此好好認識。」

他在文章中提到，有人用置身事外，或憤怒憂傷等態度對付SARS，都於事無助，醫療人員應盡可能冷靜想想，在怎樣的戰鬥位置上，做什麼事最能發揮自己的功能，然後開始行動，才能讓自己的情緒逐漸穩定，對抗SARS。

他說，現在不是究責的時候，需要的是彼此理解、提醒、激勵，盡快走出否認、孤立和憤怒；一般民衆要配合一些不同於平常的措施，學習不受時空限制的支持，即使隔離仍能相互陪伴。

精神科林喬祥醫師走進松山醫院陪伴抗煞團隊的報導，文中「半夜哭泣的醫師」即是羅慶徽。圖片提供／羅慶徽

白袍兄弟心靈砥柱

——林喬祥醫師

在松山醫院的抗煞團隊中有一位具有特殊功能的角色——林喬祥醫師（今花蓮慈院精神醫學部心理治療及諮商中心主任）。感謝他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他不但是麻吉，更是良師益友。不過，這小子「背叛」了我，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了我，還在那篇報導裡把我形容為「半夜哭泣的醫師」，文章刊出時，我完全不知情，事隔一年半載後才知道被他出賣了。我曾經報復性的開玩笑跟他說，「這病毒最好不要捲土重來，若再有SARS，我要封你為『白天哭泣的醫師』。哈！」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當時基於防疫我都不敢回家，暫居在民族東路上憲兵司令部（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的營區，每天搭計程車到松山醫院上班。有一天早上準備要上班時，手機響起，是林喬祥醫師打來的，我接起電話後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大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我們又損失了一名同伴……」那時高雄醫學大學畢業的年輕醫師林永祥因為染煞不治殉職。電話那頭，林喬祥醫師一直哭一直講。我因為不



林喬祥醫師與羅慶徽醫師因共同抗煞而情同兄弟，現同在慈濟醫院團聚。圖為林喬祥於二〇〇八年四川震災後至重災區醫療關懷。攝影／顏霖沼

願意在計程車上讓司機聽到我們的對話，決定改成走路，沿途聽他傾訴，講到手機熱得發燙，輪流換手拿，實在不行了，又拿出手帕、又想辦法把衣服拉起來這樣包著，一邊換手又繼續講，一只充飽電的手機就這樣被他哭到沒電，手機還熱得要命，還好手機沒有引爆。當時真的沒辦法，說什麼我都不能讓通話斷掉，不給他時間讓他哭完、把壓力釋放完，我也很怕他會出事。那時每個衝擊對我們這群人來說，都是超大的壓力！

一位精神科專業領域的醫師都有這麼嚴重的反應，可以想見當年那樣緊繃的狀態下，沒有人是不嚴重的！現在的我只要偶爾服用半顆安眠藥，大概就昏睡到第二天中午了，但那段時間，我連吃兩顆安眠藥都還睡不著。林喬祥醫師本來已經談好要到花蓮慈院服務了，SARS 發生時，他主動跟慈院說要晚一點報到，接著就志願進駐松山醫院支援。其實我們原本就認識，但

那段時間我們一起共事，有他在，對我、對整個醫療團隊，都非常重要。他的精神醫療專業學識、人文素養各方面，都是醫療團隊很大很大的依靠。

沒錯，他可說是我們所有人的情緒垃圾桶，那些沉痛的、脆弱的、包含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的恐懼，只能向他傾倒。正因為如此，當他需要宣洩時，我必須要接住，因為我們是互相依存的夥伴，否則要怎麼去捱過那段日子、要怎麼面對種種未知的考驗？我們的感情很微妙，這樣才叫兄弟啊！那段抗煞歲月已經遠去，當然不希望再來一次，但一想到當時有彼此在，真是太感恩了。

沒見過面的抗煞密友

我在抗煞期間認識了好幾位滿特別的慈濟人，主要接觸的是松山區慈濟志工，像是游美雲師姊、陳明哲師兄等人。不過真正與游美雲師姊成為不錯的朋友，是很後來的事。SARS 期間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面，頂多通個電話。但是人生多好玩，就在 SARS 結束之後過了幾個月，有一次我與女兒到宿舍後面的公園走走，游師姊正在公園帶活動，我聽到她的聲音之後，沒見過人喔，就直接走過去問，「妳是游美雲對不對？」「對呀。」她也沒問我是誰，但我們兩個人就抱在一起。女兒一直笑，然後問我，「把拔，這是不是又是你 SARS 的朋友？」我說對呀。這種感覺，說是革命情感也好，說是合作默契也算，感覺就是很親近，生死與共的經歷，熟悉到毋須多言就能辨識到彼此，而這種感覺，只發生過兩次。

另一次是與支援和平醫院的璩大成醫師（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相認。SARS 期間我們經常通電話，互相交流，彼此扶持。他曾經因為發燒而疑似染煞被隔離並通報為病例。其實那段日子裡，整個時空感、病識感都容易發生錯亂，我也有一次誤以為自己發燒而非常緊張。SARS 疫情結束後過了一年多，忘了我們兩人是在哪裡相遇，我們一聽到彼此的聲音，兩個大男人就緊緊抱在一起，沒有人先開口。過了好一會我才說：「『出獄』真好，我們都活著！」璩夫人陳潤秋學姊（今新北市衛生局局長）在一旁取笑我們：「你們這兩個大男人怪怪的！」她先生笑著回敬：「男人的事，女人不懂！」我們開懷大笑，這種革命情感就是雖然你們不同處一院區，但你知道有另外一個人也處在相同的處境，可能跟你一樣慘，一個人要搞定一所醫院裡面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更要想盡辦法讓病人活下去，還要應付外部各式各樣的壓力，最難的是要在眾人面前裝堅強，而你跟他都清楚知道，我們都不能一走了之，要好好守到最後一刻——守住最後一個戰友、病人！

病毒來襲真切讓我體認到，人類生來就很渺小，只是我們把自己想像得好像很了不起一樣，其實人類渺小得不得了，人類應該要謙卑，要敬天愛地，要環保護生。（整理／曾慶方、洪靜茹）



在二〇〇三年因抗煞有如生死與共的經歷，讓羅慶徽見到游美雲師姊時只覺得熟悉又親近。圖為二〇一九年九月七日羅慶徽副院長受邀於靜思書軒誠品信義店心靈講座演講會後，兩對夫妻留下合影：游美雲師姊（右）與先生龔永智師兄（左）、羅副院長偕夫人謝淑雲。圖／游美雲提供



二〇二〇年八月臺北市松山區的慈濟志工培訓課程，羅慶徽副院長（右）應游美雲師姊（左）之邀，帶著回報的心，為三十多名培訓學員上課，松山慈濟人感動回報，現場共有百人聆聽。圖片提供／游美雲

未完，下期待續。